

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政治经济主要矛盾

王健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政治经济的主要矛盾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大国竞争不断加剧与人类共同挑战日益严峻之间的矛盾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超级全球化推动，全球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世界日益“相互依存、瞬息万变、错综复杂”，具有高度的互联性、不确定性和复杂性。^①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民族国家间力量的变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为了维护霸主地位，缺乏全球化时代战略新思维，重拾冷战大国竞争的对抗思维。2022年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宣布，“后冷战时代结束，大国竞争时代开始”，美中关系进入战略竞争时代，美俄关系处于“准战争”状态，并将中国列为其“首要竞争对手”及“最大地缘政治挑战”。美国对华采取了“投资、联合、竞争”加“改变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的组合遏制手段，并公开挑动和渲染意识形态对抗和制度对立，试图建立所谓“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未来秩序之争的阵营化大国竞争态势。

大国战略竞争不仅加剧全球地缘冲突频发，而且也使得全球治理合作意愿和能力下降，全球非传统领域的安全挑战更趋严峻。据英国国家战略研究所的报告，2023年全球共记录了183起地区和地方冲突，创近30年之最。其中，2022和2023年在欧洲和中东相继爆发了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目前这两场冲突延宕和外溢不止，特别是特朗普新政府试图摆脱乌克兰危机的战略牵制，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以在大国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不仅引发了与欧洲盟国之间的信任危机，使得大国竞争态势更趋复杂，而且也将进一步激化印太地区的地缘紧张局势。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EP）发布的《2024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报告》显示，2023年恐怖主义造

^① [德]克劳斯·施瓦布、[法]蒂埃里·马勒著，世界经济论坛北京代表处译：《后疫情时代：大重构》，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版，第3-15页。

成的死亡人数达到201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约8300多人。同时，2023年恐怖主义的增长率竟达2012年以来的最高值，恐怖主义重新抬头态势明显。^①此外，2023年是全球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全球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非传统安全挑战，但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将国家利益置于全球利益之上，最典型的就是美欧对中国电动车和太阳能电池加征关税，特别是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立即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实施“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撤销电动汽车“强制令”和放松环保监管，必将阻碍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由此引发的极端气象灾难、公共卫生危机、粮食、能源危机将不断加剧。

二、全球经济科技安全化与普惠包容全球化客观要求之间的矛盾

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大势。习近平指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②虽然超级全球化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空间发展不均衡等问题，这反而更要求各国进一步加强国内改革和国际合作，以普惠包容的全球化顺应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要求，解决好资源全球配置造成的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失衡问题，使经济全球化在新的起点上发挥出自身无限的增长潜力。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迅猛发展，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方兴未艾，大幅提升了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技术条件。中国积极倡导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就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提供了有效的国际合作平台。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将全球化造成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转嫁”“推诿”给一些新兴大国，并以大国竞争视角来看待全球化发展，大搞所谓的“去全球化”“逆全球化”“泛安全化”，从而导致地缘经济思维盛行，外国直接投资中地缘政治的邻近性越来越超过地理上的邻近性和产业上的经济互补性，全球经济的在岸化、近岸化、友岸化已成基本趋势。特朗普新政府最近积极推进其“美国优先”战略，不断使用关税手段，相继出台“美国优先”贸易和投资政策备忘录，对中国等所谓“对手”国家采取进一步限制和

①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 Peace, *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24*, February 2024, p.2.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77页。

“脱钩”措施，全球投资贸易碎片化的程度将进一步加剧。有报告指出，全球经济格局正日益碎片化。这在商品贸易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94%的首席经济学家预计在未来三年内商品贸易的碎片化程度会进一步加剧。^①同时，围绕数字转型和绿色转型，美国在人工智能、数字产业和关键矿产资源等领域搞“小院高墙”“技术联盟”和“关键矿产俱乐部”，将地缘政治阵营化竞争引入全球科技产业。拜登政府下台前，出台了《人工智能扩散框架》，试图从三个层级管理盟友、一般国家和对手国家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使用。特朗普新政府上台后，将封锁围堵的重点领域由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扩展到了生物技术、高超音速、航空航天、先进制造、定向能及“其他与中国国家军民融合战略相关的领域”，这有可能使得高科技引导的相关新产业生态方面出现分叉，即出现所谓的平行世界。此外，与高科技和数字、绿色转型密切相关的重要矿产资源的地缘政治化趋向也越来越明显，因为关键矿产的储藏、开采、加工和消费的地缘分布极不均衡，通常前三大生产或消费国占据全球总量的50%以上。为此，为确保供应安全，大国间围绕关键矿产的地缘政治竞争也在加剧。所有这些措施使得全球经济前景黯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最新预测显示，全球经济今年将增长3.2%，与2024年持平，并且在未来五年内将略微放缓至3.1%。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认为这将是几十年来经济预期最弱的时期，而且从其他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全球经济预测正在被下调，以反映美国政策预期变化所带来的影响。

三、全球治理体系离散化趋势与全球力量格局深刻变化之间的矛盾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出现离散化趋势，全球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系统性失灵频频发生，特别是美国奉行霸权霸道霸凌主义，严重掣肘治理体系改革进程，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和治理赤字不断累积。作为全球治理核心权威的联合国作用下降，全球安全治理失序风险上升；为了转移国内经济社会矛盾，部分发达国家放任国内的民粹主义情绪，致使保护主义思潮和单边主义行径蔓延，参与全球治理公共产品融资的积极性下降。特别是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从一开始就带有西方普世性和殖民主义的印记，主要功能是

^①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Chief Economists Outlook*, January 2025, p.5.

维护西方的全球霸权。通过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控制，西方以普世性为借口，继续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将其他文化、价值观和治理模式边缘化。这种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无法体现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全球南方”的发展要求并承担起应对人类共同挑战的职责。

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格局取决于国际力量对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源于国际力量对比变化。”^①以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标志，“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全球力量对比发生新的变化。在此背景下，战略自主性不断增强的“全球南方”更加积极参与全球治理议程设定，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程。2023年4月，《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将“不选边”的25个最大经济体群体称为T25（Transactional 25），即“交易型25国”，其中包括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土耳其、越南、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卡塔尔、尼日利亚等，其人口和GDP分别占到全球45%和18%，超过了欧盟所占份额。^②同年6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将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南非、土耳其称为“全球摇摆国家”，认为这些国家不断提升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各自地区正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互联网治理等关键跨国问题上塑造相关政策，并在危机外交中承担起更为积极的角色。^③联合国未来峰会《未来契约》（Pact for the Future）的制定，金砖国家的两次扩容，非盟加入二十国集团（G20）以及印尼、印度、巴西、南非连续4年担任G20主席国，全球治理迎来“南方时刻”，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同时也反映了全球南方的发展诉求。应该说，全球南方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就，今后还将不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演变。

①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9页

② “How to survive a superpower split”, *Economist*, April 11, 2023.

③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lliances in a Shifting Global Order: Rethinking Transatlantic Engagement with Global Swing States*, June 2023, p.2.